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日關係的現況與展望

doi:10.30390/ISC.199110_30(10).0003

問題與研究, 30(10), 1991

Wenti Yu Yanjiu, 30(10), 1991

作者/Author：張隆義

頁數/Page：22-3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1/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110_30\(10\).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110_30(10).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日關係的現況與展望

張 隆 義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中華民國與日本在歷史上與地理上有其不可分割的關係，儘管在一九七〇年代由於美國對中共政策的轉變，使日本也受到影響，而與中共建交並與中華民國斷絕正式外交關係，但雙方長久深遠的各種關係，仍互相維繫著。

由於中華民國在經濟上的輝煌表現，創造了世界性的奇蹟，對外貿易大幅成長，也帶動了國內各種產業的發展。而日本是東亞唯一的工業化國家，也是世界經濟大國，促使中華民國與日本在經貿關係上，發展更密切的關係，在經濟發展上對日本的依賴關係加深了。

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中華民國積極推動政治革新，採取對外開放政策，取消國人到國外觀光之限制，放寬外匯之管制，對外投資之限制，改變對大陸的政策，取消戒嚴、開放言論出版之自由、開放黨禁等措施，也因而使中日關係從經貿的層面迅速發展到各個層面。

因此，中日關係的發展，在斷交後，不但沒有萎縮的現象，反而更加增進。中日雖無外交關係，但以我國的「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的「交流協會」這種民間機關，作為彼此溝通的管道，分別處理雙方各種實質民間業務。

在國內外情勢迅速變化與雙方關係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雙方也衍生許多問題必須立刻迅速有效的處理與溝通，在缺少官方決策單位直接參與與政治顧慮的情況下，也常產生許多摩擦與誤解，這些情況的累積也造成許多不便與加深誤解，必須設法解決，以免情況更形惡化。

本文擬就中日雙方在一九七二年外交關係斷絕以後，雙方關係的變化加以說明，並探討雙方所衍生的問題及尋求解決的方策，並對雙方將來的關係作一展望。

二、雙方日益頻繁的交流

中日雙方之間的正式外交關係雖然斷絕了，但是雙方長期所建立起來的固有關係却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切斷的，雙方既存的關係牽涉到彼此的利益，有必要加以維繫，於是各種非官方的組織或團體不斷成立，代替了原有的溝通管道，在沒有邦交的國家關係間，建立了一個新的發展模式，使彼此受益。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七三年三月日本政界領袖灘尾弘吉號召自民黨有識國會議員，成立「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積極促進與中華民國的親善關係，每年均組團來華訪問，以行動表示支持中華民國的態度。據自民黨總部統計，到本屆國會議員選舉之前止，參加日華議員懇談會的有二百二十一人。^①因為國會議員在日本政治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所以國會議員組織的親善團體，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另外，在野的民社黨亦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由民社黨國會議員邀請勞工團體的高級幹部、民間學者參加，組成「日華懇談會」以擴大中日交流。該懇談會經常利用各種機會促請日本政府重視和改善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例如擔任該會幹事長的民社黨參議員井上計於去（一九九〇）年六月四日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中，對海部首相、中山外相、坂本內閣官房長官、谷野外務省亞洲局長等政府首長質詢，強調中華民國和日本的密切關係，呼籲日本政府應改變過去那種僵硬的對中華民國政策。他在會議中指出，近年來亞洲情勢變化很快，日本的亞洲政策也須調整。中華民國和日本在人的交流和貿易關係上相當密切，日本改變它僵硬的對中華民國政策的時期已來到。他說明美國和中華民國之間的「台灣關係法」，並指出日本有必要與中華民國訂立類似的法律，加強雙方實質關係。^②

會上井上計並批評日本政府最近對中華民國的一些作法，例如拒絕讓中華民國部長級官員（指當時經濟部長陳履安）率團來日拓展貿易，不准日本國立大學教授訪華，取消給予中華民國人民七十二小時過境免簽證，而於實施前才匆匆通知，以致造成中華民國對日本的作法很不滿，反日情緒高漲，這是件很重大的事情，對亞洲的和平安定不利，日本應正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③井上參議員的質詢雖然都是採只提出問題的方式，並未要求答辯。他主要是讓大臣和國會議員瞭解中日兩國的緊密關係以及存在兩國之間的問題，日本應正視問題盡力設法改善。^④

註①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七月十三日，第二頁。

註② 自立早報，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八日，第三頁。

註③ 「井上計議員、政府に迫る」、Asian Report, 一九九〇年七月號，第一〇一—一五頁。

註④ 同註②。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一向親中共色彩濃厚的日本社會黨，一直將訪問台灣及南韓視為大忌，但在近年社會黨意識到台灣地位愈來愈重要，應加強了解台灣時，在去年五月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井上普方在密訪台灣的行動中，打破了這項禁忌。爾後，七月前社會黨委員長石橋政嗣以個人名義訪問中華民國，並會見李總統。後來石橋本人在報紙上發表評論表示，國際情勢的激烈變化，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受到變革的暴風的襲擊，看到這種情況，如果再固守原來的觀點，可能造成錯誤。在這種情勢變化之中，自民黨中敵視中共親近台灣的人物，也改變態度，要為海峽兩岸關係搭橋而訪問北平，至此社會黨自也不能固守成規，一成不變。他文中提到台灣的人民對日本的感情，有意外的好感，我們自然不能毫不關心，給予適當的回應。

⑤ 石橋在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訪問中華民國，訪華期間並拜會李總統登輝先生。此次訪問促使日本社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八月二日決定允許其國會議員（中委會委員除外）訪問中華民國。

在禁令解除後，日本社會黨眾議員上田卓三、左近正男、和田貞夫、和田靜夫及參議員谷畑等五人於同年八月二十日，率領日本中小企業聯盟一行二百多人來台訪問，這是中日雙方政黨間的交流，也是雙方民間中小企業的一種交流，相當具有歷史性的意義。⑥該五人社會黨國會議員團除訪問民進黨中央黨部外，並拜見外交部長錢復。由於日本社會黨是第一大在野反對黨，在國會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彼等建議錢復，我國政府與自民黨發展友好親密關係外，也應加強與日本社會黨或其在野黨派的關係。而此時社會黨議員的來訪，可說是為我與社會黨的加強聯繫，鋪了一塊堅實的踏板。⑦

在文化界方面則有東京日華文化協會、福岡日華文化協會；在中共研究方面，有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協會；在經濟界有東亞經濟人會議、臺資會、日華觀光交流協會；科學技術方面有東亞科學技術協力協會等組織，在促進中日文化、學術、經濟、科技等的交流。此外，亞東親善協會及設在日本全國各地的日華親善協會，也都在促進雙方民間親善活動。⑧

另外，在一九八九年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嶋嶺雄先生等幾位日本有識之士，鑒於近年來中華民國台灣在政治、經濟方面的發展令人刮目相看，將來對整個亞洲的影響，將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然而日本與中華民國彼此之間交流的管道，與雙方關係的現實情況與需要相比，顯然極為不足，亦不相稱。於是日本一些著名的政治學者與財經界領袖乃發起一自主的民間會議“Asia Open Forum”，希望在邁向二十一世紀之際，能够使中日雙方學者專家及工商界領袖，對亞洲所面臨的各

註⑤ 石橋政嗣，「一つの中國」願て台湾行，朝日新聞，一九九〇年九月七日，「論壇」欄，第五頁。

註⑥ 自立早報，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二十日，第二頁。

註⑦ 自立早報，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第六頁。

註⑧ 張隆義，「當前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關係」，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六卷第十一期，民國七十六年八月，第一一十一頁。

種問題，有一個廣泛、深入且公開討論的管道，並促進中日之交流與相互瞭解，從而加強中日雙方的關係。中嶋教授為促成此事，數度來華洽商與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共同舉辦此項會議，並將會議中文名稱訂為「亞洲展望」研討會。第一屆會議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廿六、廿七日兩天在台北召開，邀請一百餘位中日兩國學者專家及工商界領袖，就亞洲的政經情勢、中華民國台灣在亞洲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日雙邊關係等問題進行研討，李總統亦特別在開幕典禮中蒞臨致詞。^⑨

亞洲展望研討會第二屆會議在去年七月於東京舉行，亦受到日本各界的重視，日本首相竹下登及前經濟企畫廳長官高原須美子亦參與盛會，竹下登並在歡迎酒會中致詞，咸認為是日本政界敢面對台灣的開始。^⑩今（一九九一）年九月第三屆會議在台北召開，李總統與郝院長亦分別在開幕典禮與閉幕典禮中致詞，日本自民黨幹事長小淵惠三雖未出席會議，亦致祝賀詞請人代讀。這個研討會結合了產、官、學各界人士，擴大了雙方接觸的層面，建立了一個新的定期的交流管道。

相對地，我國的黨政、企業界、新聞界受訪問日本，在近年也是越來越多。例如，去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日斷交後十八年，立法委員首次組成十四人的赴日訪問團，在副院長劉松藩的率領下，與日本朝野各政黨廣泛交換意見。劉松藩說明該團已經創下國會外交「接觸面最廣、拜訪層次最高」的紀錄，並決定成立「中日國會議員聯誼會」，建立雙方新生代國會議員制度化、組織化的往來管道。^⑪

繼立法院副院長劉松藩率團訪日後，另由六位朝野立委所組成的「日本考察團」於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啟程，考察重點包括日本國會運作實務、中日關係現況、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及加強與日本新聞界溝通等。此次朝野立委組團赴國外考察政經問題，乃打破以往過去跨黨的「禁忌」，而由國民黨立委洪玉欽領銜，尚有立委林志嘉、林錫山，民進黨立委彭百顯、王聰松、余政憲等六人。他們強調中日斷交十八年來，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難以突破，希望藉此行能以「國會外交」來完成「任務」，力促日方派遣高級官員來台，發動日本企業來台採購，以平衡中日貿易逆差，力促雙方政府達成技術人員交流計畫、提供「品質管理」經驗予台灣以符合日本市場需求、促成中日國會議員於每年定期討論中日問題，並於第三國舉行聯誼活動。^⑫

中日斷交似乎並不影響雙方人民的交流，一九七二年日本訪華的旅客人數有二十七萬七千人，但翌年為四十三萬八千人

註⑨ 筆者曾參與籌備第一屆「亞洲展望」研討會的工作，所撰「亞洲展望研討會的緣起」，分發給出席會議的人員，對該研討會成立的宗旨與經過有一簡要的說明。

註⑩ 自立早報，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二十日，第二頁。

註⑪ 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第四頁。

註⑫ 自立早報，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第六頁。

表一：訪華外國人旅客數

單位：人

年度	總人數	日本
1980	1,111,130	654,413
1981	1,116,008	592,682
1982	1,111,406	575,686
1983	1,166,791	595,042
1984	1,227,450	634,236
1985	1,195,443	617,830
1986	1,333,315	691,984
1987	1,510,972	794,537
1988	1,696,677	909,044
1989	1,768,541	962,545
1990	1,712,680	914,750

資料來源：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1.

，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⑬一九八九年日本到台灣的旅客已超過九十六萬人，另一方面，中華民國到日本的旅客也超過四十九萬人。到中華民國訪問的外籍旅客以日本人為最多，在赴日旅遊的外國人中，中華民國亦僅次於美國居於第二位。中日雙方互訪人數，自一九八四年以來，每年均超過一百萬人次。^⑭一九九〇年日本來華旅客雖然略減，但仍超過九十一萬四千人，這在沒有邦交的国家，關係如此密切，反倒令人感到訝異（見表一）。

三、貿易不平衡亟待改善

中日雙方的經貿關係，隨著兩國經濟的快速成長，有著極為顯著的增長。在對台投資與技術合作方面，過去均以美國的投資金額最多，但自一九八〇年代以後，不論在投資件數或金額方面日本均逐漸超越美國。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九〇年止，日本企業來華核准投資件數累計達一千八百一十九件，總金額為三十六億八千二百四十八萬二千美元，一九八九年核准投資為二百三十三件，共六億四千零五十五萬二千美元，比前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八點三，一九九〇年為一百七十九件，共八億二千六百八十萬美元，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九，是外國對華投資件數最多、金額最大的國家（見表二）。

在雙方貿易額方面亦不斷增加，在一九七二年斷交時，雙方貿易額為十四億二千萬美元，一九七三年增為二十二億五千萬美元，以後亦不斷繼續成長，去年則雙方貿易額已達到約二百四十三億美元。貿易額的擴大也使我國對日輸出和輸入的差距愈形擴大，達成巨額的對日貿易人超。一九八一年我國的對日貿易赤字曾達到三十四億四千萬美元，翌年一九八二年由於國際經濟不景氣和國內投資意願降低，我國的輸入減少，對日貿易赤字亦降為二十四億美元。但當國內及國際經濟景氣復甦後，對日貿易赤字又逐漸上升。^⑮去年已經達到史上最高紀錄的七十六億六千萬美元（見表三）。

固然從巨大的貿易額可以看出中日兩國間經濟有很重要的相互依存關係，可是一方貿易赤字的過度增加，決不是良好的現象，維持適度的平衡是雙方必須努力的目標。兩國間貿易的不均衡，過去一度使中華民國和日本的關係發生緊張，我國經

註⑬ 深田祐介，「亞洲開放時代的中日關係」，第一屆「亞洲展望」研討會論文，民國七十八年六月。

註⑭ 張隆義，「最近中日關係的現況」，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日本亞洲太平洋論壇（團長田中健二）來華訪問時，在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座談之引言報告。

註⑮ 同註⑧。

表二 外人在華投資狀況(核准者)

單位：千美元

年 度	項 目	總 計		美 國		日 本	
		件 數	金 額	件 數	金 額	件 數	金 額
總計(1952-90)		3,585	11,297,838	811	3,291,669	1,819	3,682,482
1955		2	4,423	2	4,423	-	-
1956		2	1,009	2	1,009	-	-
1957		4	48	1	11	3	37
1958		3	1,116	-	-	3	1,116
1959		2	145	1	100	1	45
1960		8	14,338	5	14,029	3	309
1961		5	5,964	1	4,288	3	1,301
1962		26	3,543	8	738	16	2,664
1963		16	10,347	9	8,734	6	1,397
1964		13	11,890	7	10,196	2	728
1965		36	35,140	17	31,104	14	2,081
1966		52	20,904	15	17,711	35	2,447
1967		107	38,666	18	15,714	76	15,947
1968		122	53,445	20	34,555	96	14,855
1969		111	81,938	30	27,862	75	17,379
1970		71	109,165	16	67,816	51	28,530
1971		44	125,148	17	43,736	17	12,400
1972		52	100,190	17	37,307	26	7,728
1973		150	193,688	29	66,876	92	44,599
1974		83	108,736	21	38,760	50	38,901
1975		41	70,940	13	41,857	22	23,234
1976		45	102,032	8	22,236	26	30,760
1977		50	95,186	17	27,833	20	24,145
1978		66	136,719	18	69,765	43	50,336
1979		73	181,483	19	80,375	39	50,462
1980		71	243,380	15	110,093	35	86,081
1981		73	356,294	25	203,213	27	64,623
1982		82	320,286	33	79,606	24	152,164
1983		100	375,382	35	93,294	33	196,770
1984		100	518,971	41	231,175	28	113,978
1985		107	660,703	42	332,760	32	145,236
1986		206	705,574	56	138,428	88	253,596
1987		363	1,223,069	74	414,061	207	399,240
1988		438	1,061,161	60	134,726	212	431,867
1989		478	2,241,026	54	343,002	233	640,552
1990		376	2,081,657	61	540,367	179	826,800

資料來源：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1.

濟部在一九八二年二月曾經宣佈禁止一千五百三十三種消費品和大型汽車及其零件自日本進口，以促使日方謀求改善措施。¹⁹

中日貿易產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於兩國產業結構的差異。我國對日輸出的商品，大部份為價格低廉的農產品或加工品，而從日本輸入的商品，則大多為高價的機械設備或農工原材料品，加以國人愛用日本產品，政府也逐漸開放市場，使自日輸入額年年增加。

表三 中華民國對日貿易統計

單位：千美元

年度	總計			日本		
	輸入	輸出	差額	輸入	輸出	差額
1972	2,513,502	2,988,123	+ 474,621	1,046,002	376,738	- 669,264
1973	3,792,496	4,483,366	+ 690,870	1,427,697	823,784	- 603,913
1974	6,965,757	5,638,993	- 1,326,764	2,214,948	844,005	-1,370,943
1975	5,951,650	5,308,771	- 642,879	1,812,220	694,234	-1,117,986
1976	7,598,931	8,166,340	+ 567,409	2,451,499	1,094,754	-1,356,745
1977	8,510,887	9,360,710	+ 849,823	2,642,984	1,120,070	-1,522,914
1978	11,026,931	12,687,140	+ 1,660,209	3,678,051	1,570,253	-2,107,798
1979	14,773,700	16,103,426	+ 1,329,726	4,561,431	2,248,576	-2,312,855
1980	19,733,135	19,810,618	+ 77,483	5,353,230	2,173,440	-3,179,790
1981	21,199,551	22,611,197	+ 1,411,646	5,928,525	2,478,738	-3,449,787
1982	18,888,375	22,204,270	+ 3,315,895	4,780,222	2,382,307	-2,397,915
1983	20,287,078	25,122,747	+ 4,835,669	5,586,683	2,477,068	-3,109,615
1984	21,959,086	30,456,390	+ 8,497,304	6,441,861	3,186,462	-3,255,399
1985	20,102,049	30,725,662	+10,623,613	5,548,847	3,460,945	-2,087,902
1986	24,181,460	39,861,504	+15,680,044	8,254,741	4,559,809	-3,694,932
1987	34,983,380	53,678,748	+18,695,368	11,840,566	6,986,014	-4,854,552
1988	49,672,800	60,667,362	+10,994,562	14,825,440	8,771,697	-6,053,743
1989	52,265,326	66,303,952	+14,038,626	16,031,015	9,064,862	-6,966,153
1990	54,716,004	67,214,446	+12,498,442	15,998,428	8,337,715	-7,660,713

資料來源：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1.

我國對日貿易逆差急遽擴大的問題，政府一向關切，但據經濟部官員表示，多年以來日本政府對此一問題連談都不願談，每次都派遣毫無決策權的小課長前來敷衍，使我國甚為惱怒，甚至連總統在就職記者會上亦公開表示強烈不滿。

從經濟現實來看，我國連年出現鉅幅貿易順差，擴大對日本進口，不但有助於改善出超問題，而且對消費者嘉惠良多。在這種情況下，刻意強調對日貿易逆差問題，實有違國際貿易原理。加以我國對日進口七成以上是日本零組件與中間原料，如積體電路、錄放影機磁頭、壓縮機、汽車引擎、石化原料、鋼鐵、機器設備等，反映出我國工業以及工業產品出口對日本的高度依賴。所以自一九八六年我國出超急遽擴大以來，對日貿易逆差即隨之擴大。以目前國內這種工業發展的形態而言，若意氣用事，與日本決裂，互相報復，吃虧的多半還是自己。^①

導致當前台灣對日貿易持續巨額逆差的固固然很多，但最基本的的原因是兩國經濟發展程度與產業結構的差異造成的。近年來，台灣對日貿易持續呈現巨額逆差的現象，正反映台灣要求日本技術移轉，產業升級的成效有限，且台灣研究發展與技術開發能力嚴重不足。站在台灣經濟發展長期展望的觀點，加速推動技術移轉與本身技術的研究開發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低工資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台灣經濟必須從勞動密集型的傳統製造業走向技術與資本密集的製造業。最近政治民主化過程快速進行，勞工意識高漲以後，更需要加速這樣的轉變。不過，對日本生產技術過度

註① 「自立自強才是改變對日貿易逆差的良方」，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二日社論，第三頁。

依賴的結果，一方面降低研究開發之意願，另一方面日本廠商又不斷發展更進步的替代產品或生產方法，使台灣很難超越日本，無法擺脫對日本技術之依存程度。為有效調整結構性的中日貿易失衡，台灣經濟必須一方面加速調整產業結構，另一方面努力加強拓展日本市場。^⑮

行政院經建會官員曾指出，減少對日貿易逆差，單方面的努力很難得到預期的效果，這從我國以往採取「限向日本以外地區採購」、「禁止自日本進口」等多項措施，但始終無法阻止逆差情況的惡化，即可窺見一斑。

經建會分析表示，要縮小對日貿易逆差，並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何況目前台灣自日本進口金額已為出口金額的兩倍，使得調適起來格外費力。經建會認為對於對日貿易逆差問題的處理，應依下列幾點基本原則來進行：(一)對日貿易逆差的改善，應在不違反市場機能的情況下進行，亦即應避免使用人為的限制措施。(二)改善對日貿易逆差應擬定一整套內容一致的辦法，零散的措施可能因孤掌難鳴或效果互相抵觸而徒勞無功。(三)減少對日貿易逆差應以不妨礙我國的經濟成長及長期發展目標為前提，亦即應以積極拓展對日出口為主，而消極減緩自日進口為輔。(四)平衡中日貿易的努力應以中日雙方共同合作為基礎。^⑯

我國政府對處理對日貿易逆差的基本態度極為正確，在不違背經濟正常運作之下，適度以「意見」及「動作」向日本表達不滿的立場，亦期望日本能够善意的回應。

四、雙方必須提昇溝通管道

中日於一九七二年斷交後，我國以「亞東關係協會」，日本以「交流協會」，作為彼此溝通的管道，發展實質的關係。交流協會在台北與高雄設有事務所，亞東關係協會在東京和大阪設有辦事處，在福岡和橫濱設有分處，分別處理保護本國僑民，出入國手續，促進貿易、技術合作、學術、文化、體育等交流的各種實質民間業務。日本交流協會只是個民間公益法人而已，不像「美國在台協會」是有「台灣關係法」等強固法律為其依據的政府代表機構。

由於沒有邦交，日本政府的官僚、高官不能來華訪問。各部課長級以上的官員不能到台灣，能到台灣最多也是課長輔佐而已，致使意見無法明確溝通。我國駐日本的亞東關係協會的地位也有很多問題，諸如不能和日本的各部會直接交涉，人員的擴充和加強有困難，職員的身分也未獲充分保障，工作人員雖有六十五人，但自一九八八年六月起，五年之內却不得增

註⑮ 梁國樹，經濟自由化與未來中日經貿關係的展望，第三屆「亞洲展望」研討會論文，民國八十年九月，第一七、一九頁。

註⑯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二日，第十頁。

加。²⁰

日本名作家深田祐介表示，在日本國民的意識裏，和北韓的邦交真是處於完全斷絕的狀態，然而從與中華民國台灣間的經濟、人事交流的緊密程度而言，如果說兩國沒有邦交又怎麼不叫人感到訝異呢？但從中央階層的政治意識方面來看，日本則認為大國的中國大陸的存在是絕對的龐大，認為與中國大陸間友好的意義較為「深遠」，因此對於大陸的動向就特別神經質，對台灣就只有裝作沒看到，這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日本被十一億中國大陸市場所迷惑，對一直是重要顧客的台灣所存在的諸如貿易不平衡與開放市場問題，就未必表示誠意態度，這些問題也絕非沒有邦交就可以不必去解決的。深田承認，在日本國內，政府中央看中國大陸的意識和與台灣保有密切關係的民間經濟人的意識之間，仍有著重大的差距。²¹

日本政府這種故意漠視中華民國的存在，對擬開展對日關係的李總統亦頗表不滿，在去年五月二十二日的記者會中，他以惋惜的口氣指出：「在日本政府眼裏，並沒有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無論在加強外交、貿易、文化與科技的雙邊關係方面，日本政府讓中華民國政府覺得「走投無路」。李總統直接向日本政府質疑：「世界的關係近到這個程度，為何與日本的關係到了要解決的時候，却沒有一個機關、沒有一個單位可以來處理？」²²

日本政府以與我國沒有邦交為由，拒絕與我國作政府間的談判，我國外交部官員指出，這種說法根本是托詞，真正的原因是日本對中共的顧忌。我國外交部官員指出，事實上，我國與東協各國均無邦交，但是包括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均早已與我國作官方接觸，而且多有部長級的官員訪華。同時，我國雖與美國及歐洲的奧地利、法國、比利時、荷蘭，以及世界其他許多重要國家也沒有邦交，但是雙邊的官員往來也沒有如日本般的障礙，我國政府官員赴日本訪問，甚至都有相當的困難，更不用說日本官員的來訪了，根本是絕無可能。²³

日本產經新聞駐台北支局長岩野弘以一個新聞從業人員的身份，也坦白承認日本報界對台灣消息的報導有偏差之處。例如，李總統在記者會對日本的批評和呼籲日本政府，「兩國之間雖然沒有邦交，亦可以溝通」的發言，以總統本身對日本作這樣嚴厲的批評是極少的特例，理應在日本引起極大的迴響才對。但李登輝總統的發言，除了產經新聞之外，東京的各報却都隻字不提；李總統對有關大陸問題的發言是刊載了，但對日批評的部分却消失了。岩野認為如果這是大陸要人或是地位更

註²⁰ 陳鵬仁，「斷交後的中日關係」，載於張台麟主編，*展望東亞新局勢*，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七十九年，第一一六頁。

註²¹ 同註¹³。

註²² 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第四頁。

註²³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二頁。

低的人物的發言，會大幅報導，同樣沒有外交關係的其他國家元首的話，也會大幅報導才對。²⁴

日本的報紙對於中華民國經常以「台灣」稱呼，甚至使用「台灣總統」這種不當的稱呼，而避免提及「中華民國」這個國名。然而，日本對於同樣是分裂國家也沒有邦交的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北韓，却大多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來稱呼，這難道是大韓民國不加「抗議」或施加「壓力」的結果嗎？日本這種政府及報界不公平的處理態度，已造成了中華民國人民對日本不滿的情緒，而常藉著事件的發生爆發出來。

中日雙方溝通的不良，理解的不足，缺少正確適當的資訊的傳達，常常是造成雙方摩擦的原因。中華民國方面固然應該冷靜處理對日問題，日本方面也應該努力克服對中共「狂犬病恐怖症」，建立自立外交的勇氣。

確實，自李登輝總統就任以來，努力設法突破中日關係的僵局，日本報紙對有關中華民國的消息報導也明顯增加了。²⁵日本學術界人士、民間團體也逐漸促請日本政府要重視與提昇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例如，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以木內信胤為代表，向竹下首相、小淵官房長官提出「學者專家集團」的見解，要求改善對中華民國的關係。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全國日華親善協會聯合會會長山崎龍男（參議院議員、前環境廳長官）拜訪坂本內閣官房長官，再度提出要求改善對中華民國關係的「期望書」，要求日本迅速改善中日實務關係，倣效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制定「日華關係法」早日實施，以誠意積極解決嚴重的我國對日貿易赤字，改善亞東關係協會等所有中華民國機關的待遇，協助中華民國加盟國際組織等。

²⁶ 反應這種要求改善關係的呼聲，日本經濟貿易訪問團在團長赤澤璋一（國際經濟交流財團會長）率領下，於今年五月十三日來台訪問一週，自一九七二年中日斷交後，首次有通產省的現職官員，如小川忠夫（前經濟協力課長）、北西亞課長篠原徹、半官方組織的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理事北川幸昌等多位政府民間重要人物參加，這是中日經貿交流歷年來最盛大隆重的一次。

赤璋團長在歸國前表示，這次的訪問活動，在「促進相互瞭解與交流上，獲得滿意的結果」，對於購買台灣產品及日本技術移轉等也有一定的成果，同時對中華民國方面要求日本擴大對台投資等五項要求中，特別是為改善貿易不均衡而設置追

註²⁴ 岩野弘，「中華民國に高まる對日批判の意味」，中華週報（日本），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四九〇號，第九頁至十三頁。

註²⁵ 根據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新聞組所作的「一九九〇年日本大眾傳播對我國有關新聞報導的研究分析」，一九九〇年五大報（朝日、每日、讀賣、產經、日經）對中華民國消息的報導有一千三百五十件，比一九八九年增加了一百八十七件。見中華週報（日本），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一五三三號，第十六頁。

註²⁶ Asian Report，一九九〇年九月號，第四頁至五頁。

踪的常設機關，擬積極促其早日實現。²⁷這個訪問團對改善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已踏出前進的一步。

剛於今年七月奉派為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的許水德，已在短期內掌握了對日關係的重點，於七月間先後拜訪過九位大臣，包括環境廳愛知和男大臣、農林省近藤元次大臣、科技廳山東昭子大臣、通產省中尾榮一大臣、文部省井上裕大臣、大藏省橋本龍太郎大臣、法務省左藤惠大臣及前首相竹下登。許代表都是在大臣辦公室進行拜會，絲毫沒有避諱，充分顯示日本高階層官員對卸任內政部長許水德的重視，同時也顯示日本高階層官員希望透過許水德與中華民國最高決策階層建立良好的非正式溝通管道。²⁸

許代表指出，今後他將致力提昇中日實質往來關係，並儘量配合政府的政策，縮短中日貿易逆差，促使日本廠商真正將重要的技術移轉給台灣廠商。許代表在接受日本讀賣新聞的記者訪問時，也透露我國「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的名稱，因為不易為日本人了解，辦事諸多窒礙，我方研究改為「台北駐日代表處」，並正和日方協商中。日本人多不了解亞東關係協會是那一個的組織，以及所辦何事，而中日兩國人民的交流往來頻繁，為便於對領事業務及旅客提供服務，乃有此項擬議。據了解，在蔣孝武擔任駐日代表任內，已有更名的構想，已與日本外務省交涉一年多，據指出，近來外務省的態度有轉趨「可以考慮」的傾向，²⁹希望能夠早日實現。

總之，從最近中日關係的變化來看，雖然還有許多問題存在，需要雙方進一步溝通與諒解，但顯然地日本已開始改變對中華民國的態度，預料雙方溝通的管道將更趨順暢和緊密，關係的好轉已有明顯的跡象。

五、今後展望

日本過去只重視經濟的發展和追求經濟利益，對國際政治事務並不熱心，在外交方面也只是追隨美國的脚步，並沒有自己明確的外交政策。但自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歐美各國期待日本在國際上應負起與其經濟能力相符合的政治責任。自波斯灣戰爭發生後，日本已積極參與國際政治事務，希望能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其在西方工業國七國高峰會議中代表亞洲，越來越表現獨特的色彩和增加發言的力量，其主動介入高棉問題充當調人，並在兩韓之間頻頻穿梭，也想在台灣海峽兩岸關係上，產生推動的作用，都是企圖把經濟影響力轉化成政治影響力的具體表現。

註27 日本工業新聞，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註28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年七月十八日，第二頁。

註29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七月十八日，第三頁。

日本要積極扮演政治大國的角色，必須堅持國際正義，並具備世界共通的政治道德標準和勇氣。所謂自由、民主主義、人權這三者所共有的政治價值與經濟信條，是當今世界邁向民主化、自由化的主要力量源泉，這從東歐、蘇聯的變革之中，已愈趨明顯。

今年八月日本海部首相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在與中共首腦會談或公開的政策演說，都與歷任首相以對過去的歷史深自省為重點，而以經濟、文化方面的友好合作關係為訴求有所不同。海部能以中共聽來刺耳的人權問題和民主化問題，坦率要求中共改善，並在軍備管制、裁軍問題方面亦要中共積極的反應，同時肯定台灣在經濟方面的成就，擬在雙方關係的基本架構內，繼續促進台灣經濟發展的立場不變。^②由此看來，日本政府已經在努力克服對中共的「狂犬病恐怖症」上，勇敢地踏出了一步。

東西方冷戰結束後，新的國際秩序正在形成，蘇聯及東歐共產集團的解體，顯示世人已從共產主義的迷夢中覺醒。經濟和貿易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新焦點，自由和民主已成不可抵擋的潮流。正如李總統在九月十九日第三屆「亞洲展望」研討會開幕致詞所說的：中華民國從來沒有獨善其身的打算，面臨新時代中的新秩序，我們花了最大的努力，調整腳步，以期趕上並超越世界新秩序的發展。對內推動各種大幅度的政治經濟改革，落實自由民主，加強金融的自由化與國際化；對外則根據務實原則，以充分的善意與誠意，參與國際組織，回饋國際社會，期為世界和平與繁榮，提供積極的助力。

不論在經濟或政治上，世人均不應也不能再忽視中華民國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免國際社會失去一個重要而具有潛力的成員。同為亞洲民主國家的一員，中日兩國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國際環境已經創造出雙方合作的有利條件，相信中日兩國進一步的合作，有助於亞太地區的整合發展。

*

*

*

註② 張隆義，「日本海部首相的中國大陸之行」，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卷第九期，民國八十年九月，第十一—二〇頁。